

林希逸解庄论

——以自然天理说的辨析为中心

刘思禾

摘要：林希逸的《庄子口义》是宋代理学家注释庄子的代表作。林希逸解庄的核心观念就是“自然天理”，他用此来沟通三教，融合庄儒。自然天理说有其玄妙的地方，但总的来说这一理解并不能成立。林希逸希望在不同的思想之间找到共通点，这一思路和其独特的理学进路有关。

关键词：林希逸；理学；庄子；自然天理说

中图分类号：K204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2)02-0089-05

在庄学史上，林希逸的《庸斋庄子口义》（以下简称《口义》）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，代表了理学观念下庄子研究的新成就。《口义》并不是简单的以理学观念阐释庄子，而是力图在思想分际之中加以融通创造。这表现在，一方面林氏力图把庄子收纳入理学的观念体系中，以艾轩学派的天理学说衡量、整合庄子思想，把庄子（包括禅宗）思想纳入理学的结构中。另一方面，林氏有意识地批判作为理学正统的朱子，他力求在程朱与释道之间寻找一条会通之路，最终以三教合一论为旨归，显示了一种独特的理学进路。不过，就庄学研究而言，林氏的思路和庄子本人的思想存在根本分歧。严格说，林氏的注解固然自成一家，其对庄子的解

释却存在严重问题。林希逸的理学思想需要专文介绍，本文主要分析林氏解释庄子上的得失。

一、林氏注庄的目的

林希逸是南宋艾轩学派的殿军，一直以理学中坚自居，积极宣扬自己学派的主张。林氏在《乐轩诗笈序》中即以朱子、象山、南轩、东莱与艾轩并列立论，要一个道统上的位置。《口义》就是在明确的学派意识下完成的，这表现在两点上：

第一，林希逸注释庄子是为了贯彻和发扬艾轩学派的基本主张。艾轩学派门户较开通，对于理学的宗旨有自己的理解，这不尽同于二程、朱子。如林亦之（网山）有诗称《齐物论》，而陈藻（乐轩）对庄子更为推崇，这对林氏有直接的影响，会通庄禅理学，这是林希逸的目的。林氏在《口义》中最后说到：“（前面评述诸家不足）独艾轩先生道既高，而文尤精妙，所以六经之说，特出千古，所

本文以《庄子庸斋口义校注》为据，引文所标页码均为此书。林希逸著，周启成校注《庄子庸斋口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。林希逸的生平、著述情况参《庸斋庄子口义校注》前言。林希逸卒年因传世文献不足一直未得确解，幸而近年福清渔溪发现了林希逸墓志铭，我们现在知道其卒年为1271年（咸淳辛未年），“先君生绍熙四年癸丑岁八月十九日……辛未岁九月十五日以疾终于家，年七十有九”。参《福州日报》，2007年4月15日。

参见明杨应诏撰《闽南道学源流》卷6、卷8、卷16，《四库存目丛书·史部九二》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8月版。黄宗羲著，全祖望补《宋元学案·艾轩学案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

收稿日期：2011-11-12

作者简介：刘思禾（1973-）辽宁凌源人，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所讲师，文学博士。研究方向：道家思想。

《闽南道学源流》卷8，第105页。《宋元学案》卷47，第1481页。

[宋]林亦之撰《网山集》卷1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1149册。陈藻《乐轩集》卷1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1152册。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。据文献记载，艾轩、网山、乐轩均注释过庄子，惟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。参杨文娟《宋代福建庄学研究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，2006年，第117-118页。

恨网山、乐轩之后,其学既不传,今人无知之者矣!”(《口义》,第512页)这一类卒章显志的手法,向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:道在这里。

其次就是要厘清理学内部的分歧。朱子遍注经史,却无意注庄子,林希逸则遍注老庄列,显然是要补上这一工作,并且要凸显与朱子的不同,这在林同后序中说到很清楚(《口义》,第515页)。林氏在庄子注中对朱子有非常明确的批评,这不仅涉及对庄子理解的问题,还涉及到心、理关系的不同理解,格致与妙悟的区别,以及在判教问题上的分歧,这说明林氏和朱子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。理解这些分歧,有助于我们理解林氏是以怎样的理学观念理解庄子。

林氏的理学观主要是三点:即心悟理,三教合一,归于自得。林氏在《发题》中说注庄要“见理素定”(《口义》,第1页),所说到理也就是这样的理,这可以说是其解释庄子的前提。了解了这些,我们才清楚《口义》的意义:这不是一个对庄子的客观解释工作,而是一个理学学者在自身观念主导下的重构工作,这就意味着重大的修正以至于扭曲。本文的目的是分析这一重构是怎样展开的,其理论效应如何,并对这一工作给予评价。

二、自然天理说的展开

以理学的核心观念来整合庄子,这是林氏解庄的根本点。依据理学观念对庄子做一个总的理解,这即是自然天理说。《天道》注中说,“此书翻来覆去,只说一个自然之理。”(《口义》,第225页)自然天理,一般写作自然之理,有时作天理自然,或者自然之道,全书中共出现40多次。

1、自然天理说的源头

林氏的自然天理说有两个来源,一是二程所讲的天理说,一是其师乐轩的自然说,林氏力图调和二说,以成为他解庄的综旨。

先来看天理说。天理学说是理学的中心,天理一词最早是由二程提出来的,明道说:“吾学虽有受,天理二字都是自家体贴出来。”天理是贯通天人的,是形上原理,也是社会准则,人性的依据。

林氏所论看起来完全遵从二程的天理说。

A.《大宗师》注中说,“情,实也……此则天地万物之实理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106页)

《天地》注中说,“万物之间,各有自然之理,行乎其中。”(《口义》,第184页)

《天道》注中说,“本者,初也,言此理出于未有万物之初。”(《口义》,第211页)

按:此数条重存有义。

B.《秋水》注中说,“道,总言也;理,事物各有之理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269页)

《知北游》注中说,“鳧短鹤长,麦垂黍仰,或寒或热,或苦或甘,皆是自然之理。”(《口义》,第332页)

《则阳》注中说,“万物各具一理,故曰殊理。”(《口义》,第410页)

《天道》注中说:“实理之中,自有条理,便是浑然之中有粲然者。”(《口义》,第210页)

按:此数条重分殊意。

《则阳》注中又有一则,“合异以为同,万物同一理也;散同以为异,物物各具一理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410页)此则兼备二意,乃宋儒理一分殊之说。

C.《在宥》注中说,“人人皆慕赏避罚,以伪相与,则岂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!”(《口义》,第163页)

《缮性》注中说,“初,自然之理性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252页)

《知北游》注中说,“性命在我,即造物之理,故曰委顺。”(《口义》,第334页)

按:此即性即理说。

林氏论性有两则可以参证。《山木》,“性者,天命之性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311页)《天地》,“所谓仪则,皆此神为之,便是性中自有仁义礼智之意。”(《口义》,第195页)

D.《养生主》注中说,“此事(一作意)盖言世事之难易,皆有自然之理。”(《口义》,第51页)

《天道》注中说,“齿爵亲贤,亦天下自然之理。”(《口义》,第216页)

此天理乃社会规范依据之说。

关于林希逸的理学思想,笔者有专文论及,此不赘述。
程颢,程颐《二程集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424页。

以上这些表述,和二程的说法基本一致,说明林氏是依据天理来解释庄子的。

与天理相对应,林氏很重视心的问题(《口义》,第21页,第101页,第302页)。林氏对于天理人欲的区分特别重视,这是他理学立场的另一个基点(《口义》,第13页,第21页,第65页,第99页,第313页)。林氏也使用了大量其他术语,如道心、人心,无极、太极等等,这些充分说明理学观念在其解释庄子时的中心地位。

再看自然说。《乐轩集》中《读庄子》诗有两句,“造物恩私多嵬琐,始知庄子得真机”,造物恩私之嵬琐乃其自然,这就是庄子所得真机。《三教》诗中作,“百年合死千年赘,一物都无万物全”,

一物都无万物全,这是从整体来看,物无死生,而得一本体之全,此意乐轩用以儒会通三教,确也可以解释庄子。林氏引乐轩论庄子说,“乐轩尝曰:庄子三十三篇,只是自然两字。”(《口义》,第113页)自然之意,当指存有之本来而言。林氏顺其师说,论自然天理,就是这样一个思路。

2、自然天理说解析

然而,问题是,自然天理说是否即是二说相加而成?恐又未必然。关键在于,“自然之理”,是“自然的天理”还是“自然底天理”?自然是优先性的,还是天理是优先性的,或者二者是并列的主词?这关乎林氏的立场究竟是在儒家还是在道家,不可不辨。

“自然之理”一类的表述理学家经常使用,在这些语境中,“自然”一词接近一般所说的“客观性”一词,是用以修饰主词“天理”的,天理为一确定的、客观的形上实体,惟此实体“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,“天理自然当如此,人几时与”,故

可称之为自然天理。那么,林氏的表述是否也是这样呢?

林氏使用“自然之理”或“天理自然”二语很多,很多时候近似上述用法,现举例如下:

《齐物论》注中解“是亦一无穷,非亦一无穷”,作“是亦无穷,非亦无穷者,言听其自然也。如此则为自然之天理。”(《口义》,第24页)“听其自然”即是“自然之天理”。

《在宥》注“不明于天者,不纯于德”句说,“言世间之事,虽不可不为,而必知自然之理则可,不明于天理之自然,则在我之德不纯一矣。”(《口义》,第181页)自然之理也即天理之自然,自然一语是系于天理的。

在很多时候,林氏强调“自然之理”的客观性意义,如:

《天道》注中说,“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。”(《口义》,第210页)

《徐无鬼》注中说,“此三句是一意,天地之间自然一定之理,决不可易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393页)

《则阳》注中说,“且无所逃者,言自然而然,不知之知,通古今,徹上下,皆如此,何处而非此理?如何逃得!”(《口义》,第408页)

显然,“自然”一语,在林氏那里更多指的是天理不可移易,不人为力所影响的属性。这与《老子》中“道法自然”中“无称之言、穷极之辞”意义上自然是不同的,林氏的自然并不是第一序的,而只是修饰性的,这与二程讲的倒是十分接近。

不过,在别的地方,林氏的用法又似乎是以“自然”为体的。

《天运》注中说,“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。”(《口义》,第244页)此处“造化生生之理”,也即自然之理意,即“自然的理”,而非如上所论“自然底理”之意。似谓“自然”有一个理。林注中亦多出现“造化”语,《庚桑楚》中一则注亦当如此理解。(《口义》,第358页)《徐无鬼》中一则亦然。(《口义》,第395页)《天下》注中说,“圣王生成之功,即天地生成之理,皆原于一。一者,造化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491页)很明显,林氏未意识到“造化之理”与“自然

见《二程遗书》,“理也,性也,命也,三者未尝有异,”第329页。“万物只是一个天理”,第80页。“天者,理也。”第178页。“一物须存一理。”第242页,“道无精粗。”第789页,第194页,第199页。程颢,程颐《二程遗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。

《乐轩集》卷1。

同上。

《二程遗书》,第80页,第1171页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中华书局,1983年版,第51页,第52页,第79页,第231页,第239页,第261页,第262页,第360页。

《二程遗书》,页80,标二先生说,当为明道语。页81。

《二程集·程氏粹言》有一则自然之理的用法,“质必有文,自然之理也。”第1171页。

王弼《老子注》,第二十五章。

天理”之间的冲突。

《天运》注中说,“达于情者,达于实理也;遂于命者,极于自然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232页)此处实理,自然对举,似乎林氏并未觉出其间的冲突。

如果以“自然”为体,那么何必要说一个“天理”呢?除非天理只是自然的一个属性,即自然所以成其然的条理。林氏多次强调“天理”之体不可说,只能体悟,更加深了这样一种印象。

当然,林氏的很多话是随文注出的,未必就是林氏的理论主张,他完全可能是接受前一种理解,而适应庄子原文做了相应的调整。不过,学理上有这么大的冲突,而林氏习焉不察,必有缘故。客观上讲,庄子 and 理学在基本立场上有明显的冲突,根本无法调和,林氏故作解人,两面不讨好。主观上讲,则和林氏独特的理学立场相关。前一点详见下文,此处主要论述后一点。

前面所引的乐轩诗中已经透露了这么几个问题:天理是否有善恶的问题?天理实体是逻辑优先性的还是非优先的?心与理为一还是为二?接受还是不接受庄子的立场,答案显然是不同的。林氏在天理问题上,显然受庄禅影响极大,虽然他一般的接受天理的社会和伦理意义,承认天理的实有性,但是他不接受对天理作任何规定,他也拒绝朱子式的逻辑在先的理解思路,也不同意心理为二。林氏拒绝对终极本体做说明,他更注重即心悟理式的实践,这一点上和朱子不同,倒是明道逆觉体证思路的继承,故而 he 领会的天理更近于性体、道体。

“自然”一词在林氏那里则主要指向本来如此的存有本身,他有时候喜欢用“太虚”一词,应该与自然一词接近,这一自然也是不可说的,只能通过“自然而然的”工夫加以接近。在林氏那里,显然认为天理和自然是一致的,就体上说,天理就是

自然,自然就是天理。在工夫上说,做到自然天理就会实现,天理实现则一切自然而然。这不过是表示本体的不同途径,而关键不是如何表示,而是如何把握,于是儒道两家的理论分歧不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把握这一终极。很显然,林氏是庄禅和理学的调和者,在明道的思路上更趋向于内在。他承认本体的实在性,但不对之加以描述,而是用悟的方式加以把握。这一思路使得他对庄子有了更为宽容的理解,自然天理说就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。

三、自然天理说评判。

1. 在文献层面上,天理说所依据的庄子本文并不充分,林氏所做的解释也并不恰切。

林氏注文中,理,天理的使用常常是很随意的,有时甚至是明显的误读,如以天理解“莫若之明”(《口义》,第23页)以天理解“天机”(《口义》,第99页)以天理解“大宗师”(《口义》,第124页)以天理解“天伦”(《口义》,第250页)“天府”(《口义》,第431页),这些观念在庄子语脉中各有含义,很难作统一解释,更何况是天理这样形上实体化的解释。更多的时候,林注把庄文中的“天”直接解作天理(《口义》,第21页、第230页),应该说,庄子文本中的天并无“理”之意,是作为一种与人为相对的价值尺度而言,郭象解为自然,这恐怕是较简明稳妥的解释,林注解为“天理”,不免凿实了。再举几例,解“知通为一”(《口义》,第26页)作“知此理之为一”,庄子本意本没有理之意,林注却要加上。“为天使难以伪”(《口义》,第65页)林氏解作“天理之日用也”,天使一语郭注解作自然,天使即顺乎自然之意,而依林氏解,则天理必有伦理内涵,这当然不是庄子本意。再如“是万物之化也”句(《口义》,第66页),林注作“此言乃造化之理,万物之所由出也”,此一理字同样是外面添上去的。再如,解“随其成心而师之”,林注说,“成心者,人人皆有此心,天理浑然而无不背者也。”(《口义》,

参见《口义》,第137页,第175页,第239页,第337页,第485页。

参见牟宗三《心体与性体》(中)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53-76页,第78-102页。

自然主要有三种意思:造化(《口义》,第364页),自然而然(《口义》,第105页,第107页),本真(《口义》,第103页,第472页,第473页)。自然而然,有时做现象学描述,有时则指工夫而言。

太虚出自《庄子·知北游》,张载喜欢用这个词。林氏使用这个词或许和禅宗有关,如南泉和赵州讨论著名的“平常心是道”时即用这个词。

无遮蔽的本质直观。参熊十力《十力语要》,中华书局,1996年,第90页,第102页。牟宗三《心体与性体》(上)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153页,第155页。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8年,第16页,第18页,第19页。

第21页)这是明显的误解,恐怕也是有意为之,就是要把天理的观念塞进去。

林氏解释庄子,天理字样随处可见,却对庄子的道论不感兴趣,勉强注几处也多以天理说解释道,如《天地》注中说,“万物之间,各有自然之理,行乎其中,故曰行于万物者,道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184页)《天运》注中说,“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。”(《口义》,第224页)《秋水》注中说,“发明至此,道之至要也,理之至极也。”(《口义》,第269页)这都是以理解道,道理并释。其他还有许多“自然之道”的说法,如“造化自然至道”(《口义》,第12页),“天地自然之道”(《口义》,第246页),“自然之道”(《口义》,第354页、第389页、第460页、第472页),这些大多是随文释意,与道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庄子的道论本来是其中中心话题之一,在林氏这里都却并不着意,这显然是因为天理一词取代了道,天理为实,而道为虚,故而盛言天理而寡言道,林氏注庄取舍重点由此可见。

这些说明,林氏并不是不知道庄子本意,而是用天理说来修正、重构庄子,使其归之以正。故而,他在文献层面上有意忽略庄子语脉本意。那么,林氏天理说可否真正解释庄子,自然天理说可否成立呢?

2. 天理说并不能说明庄子,自然天理说也不能成立。

天理说并不能解释说明庄子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天理是形上实体,而庄子思想核心观念显然不是实体性的。天理为实体性的,伊川、朱子都明确说过,林氏注中也常见过这样的说法,“天地万物之实理”(《大宗师》注,第106页),“性命之实理”(《骈拇》注,第139页),“万物真实之理”(《天道》注,第223页)等等。可以说,天理实体说是理学不同于释道的关键点。天理为实,

一是说确实“有”天理存在,二是天理是可说的,有内容的,三是天理可以作为现实社会、伦理生活的依据与法则。反过来说,庄子最反对的就是实体论,《齐物论》非常鲜明地反对任何一种有确指的思想,而以天均说化解之。如果比较儒道两家,可以说庄子是以“圣证”为中心的境界哲学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虚无。这一点实际林氏也看到了,《在宥》注中说,“观此一段,庄子依旧是理会事底人,非止谈说虚无而已。”(《口义》,第179页)他也承认庄子有虚无的一面,只是反对把庄子虚无化。林氏要把庄子思想实体化解释,言之凿凿,终究还是离题太远。林氏混淆了不同思想之间的基本分际,强合自然与天理,而以为庄孔不二,这从根本上说是不通的。

林氏的天理自然说实在是调和之论,这反映了不同理论立场之间的巨大张力,林氏不去正视这一张力,而是以悟的方式加以回避,这就能不落入左右为难的地步。林氏的这一思路,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尴尬。

结 语

林希逸以自然天理说解释庄子,根本原因来自于他的理学思想。林氏在继承艾轩学派思想的基础上,发展出一套新的理学体系,简单说就是即心悟理、三教不异、归于自得。这一思路不同于当时占主流的朱、陆,呈现出融通二程与佛道的意图,别具特色。林氏解庄正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。他的理解根本上说并没有显示出庄子的独特之处,反而着重于庄子枝节的地方。总的说,林氏的解庄属于二流的水准。

(责任编辑:陈剑)

杨黛文有类似论述,参《庄子口义的理学观》,《浙江学刊》,1989年,第3期。

伊川说,“惟理为实”,《二程集·程氏粹言》,第1169页。朱子说,“释氏虚,吾儒实……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。”《朱子语类》卷126,中华书局,1986年。

牟宗三说,见《才性与玄理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240页。陈鼓应、徐复观同亦以为庄子为境界哲学。关于儒家的特征,朱子以为儒家为实,释氏为虚。象山以为儒家公,释氏私。朱子说见《朱子语类》卷124,页2975,卷126,第3015页,第3021页。象山说见《陆九渊集》,卷2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7页。又参见牟宗三《心体与性体》,第66页,第67页,牟氏引黄梨洲论儒道之别。又劳思光说,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(三卷上)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40页。